

黔东南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主 编 / 王爱华 姚仁海

副主编 / 张雪梅 李 斌 潘年显

民间文书与 清水江地区的 社会变迁

吴才茂 / 著

民族出版社

- 201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第二批）“中国古文书学研究”（14 & ZDB024）之子课题“明清古文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 2016 年贵州省苗族侗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重点招标课题“民间文书与清水江地区社会变迁研究”（XTZD1603）的最终成果

MINJIANWENSHU YU QINGSHUIJIANG DIQU DE SHEHUIBIANQIAN

民间文书与清水江地区的 社会变迁

吴才茂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间文书与清水江地区的社会变迁/吴才茂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6. 6

(黔东南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王爱华, 姚仁海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4420 - 4

I. ①民… II. ①吴… III. ①契约—文书—研究—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②汉族—民族文化—影响—社会变迁—研究—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IV. ①D927. 732. 36 ②K297. 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9584 号

民间文书与清水江地区的社会变迁

著 者: 吴才茂

责任编辑: 张义军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政编码: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95 千字

印 张: 15.375

定 价: 38.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4420 - 4/K · 2530(汉 1417)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投稿热线: 010 - 58130111 1092781806@qq.com; 发行部: 010 - 64211734)

黔东南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
贵州省苗族侗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资助出版
凯里学院人类学省级重点学科

《黔东南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编纂委员会

总 策 划：李飞跃 冯仕文

执行策划：刘晓春 肖明龙 张雪梅

主 编：王爱华 姚仁海

副 主 编：张雪梅 李 斌 潘年显

委 员：余晓林 陈怀利 吴先佳 贺华中

江晓谷 龙 丛 吴 春 范钟声

霍盛红 郑茂刚 周江菊 王芳实

曾梦宇 廖 雨 吴 平 石 敏

肖亚丽 刘 鹤 刘宗碧 陈洪波

范生姣 龙泽江 吴才茂 罗康智

总 序

陈春声

对中国传统地域社会的研究者来说，黔东南真的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凯里学院扎根这块民族学、社会史、人类学的沃壤近六十年，一代代学者以保护、传承传统民间文化和民族文化为己任，蒐集、整理并系统研究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口述传说与民间惯俗，不过分追求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表面上的系统化，而是尽量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出对地域社会与历史传统的理解。《黔东南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的编辑与出版，真的令学界同行感到敬佩和欣慰。

我是2002年3月第一次有机会访问黔东南的，当时就深深地为这里的山河土地、风俗民情所陶醉。以后十多年间，与国内外有共同学术兴趣的朋友们一起，到黔东南进行田野考察有十余次之多，其中也包括了2015年10月凯里学院悉心安排的偏桥卫遗迹及施秉地区民族民间文化的考察之旅。徜徉在锦屏、黎平、施秉、凯里的山水之中，走在留有数百年蹄痕履迹的古老驿道的石板之上，抚摸着卫所城墙的断壁残垣，看着明代初年就从内地移居“苗疆”的军户后代跳起刚劲彪悍的龙舞；在侗乡、苗寨村口的千年银杏树下，喝着苗家的水酒，听着悠扬的酒歌；到一家一户串门，在吊脚楼里翻阅一包包乾隆朝以来一直保存的契约文书和其他文字资料；入夜后围坐在炉火周围，在忽明忽暗的火光映照之下，听妇女们以略略有点凄苦的声调唱《回香歌》；在山顶晒谷场绕着熊熊篝火，与整个村寨的人们拉着手唱歌跳舞；夜深人静之时，在苗家木楼客房的床铺上，听着楼旁山溪潺潺的流水声……这种深具“回到历史现场”意味的场景，常常历历在目，让人难以忘怀。这样的感

受，也是未曾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们难以想象和体验的。正因为这样，也就对凯里学院同行们的工作，或多或少增添了一份羡慕与敬重之情，《黔东南历史文化研究丛书》所收录的多种学术著作，因为其作者们长期浸淫在这样真切的原生态的文化氛围中，自然而然就有了一种他人所难以企及的现场感和历史感。

由于共同的学术追求，多年来中山大学与凯里学院从事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们之间多有探讨与交流，收获丰硕，而“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更使两校同行有了更好地互相砥砺、相得益彰的合作机会与研讨平台。在共同的研究实践中，我们对这块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博物馆”的土地上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了更丰富的感知，也对黔东南传统地域社会研究与民族民间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有了更多的期待。

我们知道，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现今聚居着 33 个民族，民族民间文化形态繁多，内容丰富，人文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保存都比较完整，尤其是苗族、侗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独具魅力，是世界乡土文化保护基金会认定的全球 18 个生态文化保护圈之一。黔东南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既在日常生活、礼仪行为和口述传说中存留了世代代在本地生活劳作的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的细节，研究者又可透过地方文献、民间文书的记载和上述各种细节看到王朝典章制度和国家意识形态在地域社会的表达。在黔东南，初来的研究者不时会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感慨，但更重要的是，对黔东南地域社会与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黔东南这个具有极大差异的地方社会，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国家”与“地方”的长期互动中得以形成和发生变化的，并进一步理解黔东南地区何以能够长期拥有共同的“文化”及其百姓关于“中国”的正统观念。

毋庸讳言，近十余年“清水江文书”广泛受到重视，得以大规模地蒐集、整理和研究，这是中山大学与凯里学院的同行们走到一起，共同开展研究工作的重要契机。黔东南少数民族民众珍惜、收藏文字资料的传统，使现存总数达数十万件的“清水江文书”，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史料发现之一。近一个世纪之前，王国维先生曾指出：“古

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亦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同时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的两校学者们，正是以这样的期待来面对我们共同的事业的。令人高兴的是，学者们已经发展出一套较为系统的解读乡村社会中各种资料的有效方法，包括族谱、契约、碑刻、宗教科仪书、账本、书信和传说等，这套或许可被称为“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独具特色的学问和方法，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汉学家都没有完全掌握和理解的。我们希望民族民间文化和地域社会史的研究者们，能够在大量收集和整理民间文书、地方文献和口述资料的基础上，最终建立起有自己独特体系的民间与地方文献的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将中国历史研究建立于更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

凯里学院作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最高学府，在地域社会历史和民间民族文化研究中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理所当然应在黔东南地方文化建设中贡献智慧与力量。凯里学院的同行们已经在相关领域的资料蒐集、课题研究、课程建设、政策咨询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而《黔东南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的编辑与出版，更是一个新的开始。

是为序。

于广州康乐园马岗松涛

二〇一六年七月九日

前 言

对于来自民间的历史文献，如契约文书在清代被称之为“烂纸头”，无甚研究价值，现今亦有人讥之为“鸡零狗碎”，并以“碎片化”标签其研究成果。然在近现代中国史学研究之学术脉络中，极受重视，业已取得了异常丰硕的学术成果。20 世纪初，中外学者在敦煌石窟发现了大量的经卷、写本等民间文献，他们以历史学、文学、民俗学、宗教学、艺术学等多学科方法，对之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国际性的“敦煌学”研究领域由此而生。20 世纪中期，徽州地区的民间契约文书及其他历史文献大批外流，备受中外学者关注，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徽学”。近 30 多年来，在国内的其他地区，也开始发现了大量来自民间的历史文献，出现了专题性的文献整理和资料汇编，其涉及范围主要有族谱、碑铭、契约文书、商业文书、戏剧戏曲文献、宗教文献等，并呈现出影印刊行逐渐加强之趋势，我们乐观其成，亦为能便利地利用这些来

自民间的文献进行学术研究而感到愉悦。^①

然而,对于这些来自民间的契约文书、族谱、碑刻为主的史料,似未有统一的学术概念,就日前使用的学术术语而言,除了各类文书(譬如敦煌文书、徽州文书^②、黑水城文书、石仓文书、清水江文书等)外,尚有试图包涵全部来自民间的文献的概念,主要有三:民间文书、民间文献和民间历史文献。民间文书在陈支平的表述中,似即民间契约文书^③,而从其研究利用的主要资料观之,实际上也大量运用了族谱等史料^④,然其在《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一书中专辟“明代民间文献中的福建族商史料”一章^⑤,似亦说明陈先生对民间契约文书与族谱是有区别对待的。而民间文献,王振忠对之定义为:“有别于正史、文集等传世典籍的文献,它来源于田野乡间,包括契约文书散件、未刊稿本或抄本以及少量流传范围有限的刊本。”^⑥此一概念系王先生在徽

① 有关族谱、碑铭、契约文书、商业文书、戏剧戏曲文献、宗教文献,2004年之前的主要出版情况,参见郑振满:《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遗产研究》,载《东南学术》2004年增刊,293~296页。2005年以后的出版情况更为乐观,以契约文书言之,贵州之外的即有数种,如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1辑、第2辑、第3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006、2009;陈支平主编:《福建民间文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张介人编:《清代浙东契约文书辑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黄山学院编:《中国徽州文书》(民国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曹树基等编:《石仓契约》第1辑、第2辑、第3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2012、2014;铁木尔编:《内蒙古土默特金氏蒙古家族契约文书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胡开全编:《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1754—1949)》,成都,巴蜀书社,2012;吴晓亮、徐政芸编:《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张建民编:《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罗志欢、李龙潜编:《清代广东土地契约文书汇编》,济南,齐鲁书社,2014;黄志繁等编:《清至民国婺源县村落契约文书辑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李琳琦编:《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千年徽州契约文书集萃》,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馆藏清代契约文书》,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② 兹试举一例这类文书之命名规范,即以民间历史文献发现之地名加上“文书”二字,比如徽州文书,就是指由徽州历史上继承下来的散件及簿册构成的奏折、鱼鳞图册等官府文书与卖契、合同等民间文书。参见[日]臼井佐知子:《徽州文书和徽州研究》,收入[日]森正夫等编,周绍泉等译:《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4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③ 参见陈支平:《努力开拓民间文书研究的新局面》,载《史学月刊》,2005(12)。

④ 参见陈支平:《民间文书与台湾社会经济史》,长沙,岳麓书社,2004。

⑤ 参见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315~35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

⑥ 王振忠:《民间文献与历史地理研究》,载《江汉论坛》,2005(1)。

州地区丰富的收集经验之总结，包含了未刊稿本、抄本和刊本。民间历史文献，郑振满定义如次：“民间历史文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其主要形式包括族谱、碑刻、契约文书、诉讼文书、乡规民约、账本、日记、书信、唱本、剧本、宗教科仪书、经文、善书、药方、日用杂书等，其内容广泛涉及民间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小同领域。”^①此一概念系郑先生30多年来田野经验的归纳，涵盖面极广，基本包含了现今在民间社会能见到的各类文献。

实际上，理解这些来自民间的历史文献之概念，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即存在于民间社会里的一切资料，举凡家乘族谱、金石碑刻、契约文书、科仪文书、口述传统、民间故事、戏剧戏曲、方言俚语、民俗风情，等等。就狭义而言，其要点在于：（一）这种文献是非官方的；（二）这种文献是非传世典籍，而是被新发现的；（三）这种文献的存在形式是多样的；（四）这种文献来源于田野乡间。所以，我们认为民间历史文献就是存在于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各种写本的、石刻的、口述传统而成的（如流传于黔东南一带的《开亲歌》《苗族古歌》^②等），并逐渐进入学术视野的资料。因为未被发现利用者，实不知究竟有多少，而我们亦不能一言以蔽之为民间历史文献，只有逐渐被发现与利用者，方能为世人所熟知和接受，因此，就狭义概念而言，还

① 郑振满：《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遗产研究》，载《东南学术》2004年增刊，293～296页。按：郑振满最近认为讨论民间文献应该回归到文献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并将之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由老百姓自己做（生产）出来、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文献，其编纂者、使用者、传播者都是在民间社会的逻辑中形成。因此，必须在这些脉络中思考民间文献的价值与意义。第二种，可能是民间百姓所做，但面对的对象是外人，尤其是为了欺骗官府。例如诉状、族谱，是为了自身的某种权益、身份，更多时候是具体的权利、义务，以便发生纠纷时，能够为自己提出合理化的解释。第三种，可能由地方官、胥吏或地方文人所做，对象是给百姓使用、遵循。例如告示、碑刻，内容包括规定章程、禁示、事宜等，这些文献的目的在于处理、管理民间事务，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属于民间文献。从这三个层次可以看出，民间文献已经逐渐发展成一个较具弹性概念的范畴。参见林荣盛、曾献纬：《郑振满教授谈民间文献与地方史研究》，见《台大历史系学术通讯》第17期，27页，2014年10月。

② 对于《开亲歌》《苗族古歌》等苗族口述传统的收集、整理尚待加强，而作为史料利用亦未充分，其内容涵涉极广，可开掘之处亦甚为可盼。伊懋可就曾大量利用《开亲歌》来做环境史的研究，参见〔英〕伊懋可著，梅雪芹等译：《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235～24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是局限于逐渐被发现与利用者，可能更为贴切。

然而，鉴于本书之涉及面较为狭窄，主要集中在契约文书和族谱等史料上，故仍用民间文书冠以书名。当然，这并未表明贵州清水江地区民间的文献不丰富，明清以来的清水江地区，衍生出了极为丰富的民间历史文献，只是它们默默无闻地散落在苗乡侗寨里，外界的关注和学者的开掘利用程度均有待加强而已。

事实上，外界对于贵州清水江地区，历史以来就缺少关注和认知。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从司马迁时代到明代，一直处于朝廷及其士子文人的视野之外，因而到顾祖禹论及贵州形势利害时，仍说：“贵州之地，自唐宋以来通于中国者，不过什之一二。元人始起而疆理之，然大抵同于羁縻异域，未能革其草昧之习也。”^①对于清水江流域，他甚至误把今之亮江（新化江）当做了清水江的正源，至于清水江，却只是说其“出生蕃界，东至赤、白两江口合新化江”^②，仅知道其地“乱山丛箐”，为“生苗巢穴”^③。即便更晚近的魏源，也仅知道清水江为“沅江上游，下通湖广，上达黔粤，生苗居其上，沿岸数百里皆其巢穴”^④。由此不难理解明清时代士大夫关于清水江地区民众社会生活的描述，多少有些猎奇的色彩，所谓“人以彪悍为上，苗以劫夺为生”^⑤，“蠢苗蜂聚，性剽悍，甚攻斗，劫杀无日无之”^⑥，“虽通汉语，不遵文教，刻木为券，剡木为誓”^⑦，即便偶遵文教，也是“农不能尽地利，士不能究兴微，

①（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一百二十《贵州方輿纪要序》，523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

②（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一百二十一《贵州二》，529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

③（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一百二十一《贵州二》，529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

④（清）魏源：《圣武记》，2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⑤（康熙）《天柱县志》上卷《风俗》，收入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2册，58页，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影印本。

⑥（清）张澍：《续黔书》卷一《苗警》，25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

⑦（光绪）《古州厅志》卷之十上《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9册，472页，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影印本。

其无规制而鲜条理者，数难更僕也”^①。从这些文字的刻画中，实际上可以把这里理解为中华帝国“内地的边缘”^②，用许倬云的话讲，这种区域“在经济体系中，是正规交换行为之外的交易。在社会体系中，是摈于社会结构之外的游离社群。在政治体系中，是政治权力所不及的‘化外’；在思想体系中，是正统之外的‘异端’”^③。因此，明清时代的清水江地区被看成是与外部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有着另类习俗与传统的封闭社会。^④

显然，这些明清以来客籍贵州士大夫的“碎片化”文本，不仅刻画出了令人望而生畏的苗疆社会，亦为后世学者提供了诸如“王化”“汉化”“内地化进程”“内地的边缘”的学术思考，这种问题意识很大程度上是在解释少数民族地区如何“汉化”或者步入“王朝国家”体系。然若只停留在这一层面上，似与明清文人士子的认识相去不远，只因明清士大夫亦在猎奇式的描述中也看到了社会变化的情况。比如镇远府开始“风气渐开，人文丕振，游宦者安之……水陆衝衢，商贾辐辏，民多负贩经营”^⑤；黎平府的民众“惟以礼乐诗书为事”^⑥。所以，研究清水江地区民众本身的社会生活状态及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变迁，就显得很有必要。然若仅从正史史料中论述他们的社会生活及其变迁，往

①（乾隆）《开泰县志》夏部《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9册，43页，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影印本。

② 在“内地的边缘”区域，国家权力相对缺失，地方社会秩序的建立多有赖于各种地方势力，遂形成政治控制方式的多元化；其耕地资源相对匮乏，山林、矿产资源丰富，民众生计方式多种多样；人口来源复杂，多为社会体系之外的“边缘人群”，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强烈的“边缘性”；在文化方面，异端信仰、民间秘密宗教等非正统意识形态有较大影响。“内地的边缘”区域往往是传统中国诸种社会动乱的策源地，也可能孕育某些新生力量和新因素。参见鲁西奇：《内地的边缘：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载《学术月刊》，2010（5）。

③ 许倬云：《试论网络》，见《许倬云自选集》，30～3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④ 张应强：《区域开发与清水江下游村落社会结构——以〈永定江规〉碑的讨论为中心》，载《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3）。

⑤（乾隆）《镇远府志》卷九《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6册，85页，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影印本。

⑥（乾隆）《贵州通志》卷七《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册，116页，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影印本。

往难免差池，况乎明清士人关于清水江地区的刻画，更多地呈现出一种“猎奇”的倾向。不过，以清水江文书为主的民间历史文献被大量发现，使这一研究取向成为可能。

因此，笔者首先对近五十年来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与研究成果进行盘点，试图从中找到新的研究起点。在整理前贤的研究成果时，发现有些至为重要的问题并未为人们所思考或者说关注不够，要言之有三：一是汉文字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生活习惯变迁问题；二是汉神信仰的传播及其所引起的日常生活习惯变迁问题；三是祖荫张力下的祠堂修筑、族谱编纂与华夏世胄身份的构建问题。循着这些问题，首先令人着迷者，系明清时代清水江地区本属所谓苗疆腹地，人群以苗、侗为主，而契约文书的最初发现地锦屏文斗，亦属苗寨，那么以汉文字书写的契约文书，是如何传播至该区域的？又如何为苗、侗人群所接受和使用？契约文书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便是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所要论述的主要问题，即契约文书的传播与明代卫所官军和移民有莫大关系，而该区域的不同人群在与之互动交往的过程中，契约文书的使用逐渐扩大并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形成了凡事均需书写契约文书的生活习惯，而这种习惯的养成，也逐渐冲击了该区域固有的纠纷解决机制，苗、侗人群的纠纷解决开始由“理讲”“鸣神”向“鸣官”演变，契约文书成为重要的呈堂证供，由此进一步加强了契约文书使用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实际上，明清王朝正是通过这种“文字下乡”的方式，逐渐地把朝廷律法知识体系推行到了边疆乡村社会，进而成为其重要的经营边疆或者“蛮地”的策略之一。而当地不同背景的人群自觉地使用契约文书一类的汉文字，并不断地产生以“白契”为主的民间契约文书，所有这些，均是清水江地方社会与明清王朝互动的结果。

第五章和第六章，论述明清王朝在武功、律法之外，如何利用王朝信仰体系经营边疆地区。很显然，鬼神信仰浓郁的清水江地区，成为汉神信仰得以顺利推行的最佳场域，随着明清地方官员不断修筑各类祭祀神灵的庙宇，内地的信仰体系得以在清水江地区排延开来，而当地人群亦乐观其成，并主动地参与到官方的信仰体系中来，且在社会生活中积

极利用其影响，不管是面对灾变还是日常防护，都虔诚地请神祈禳，甚至维护社会有序运行，也积极引入了神灵，让其参与监督，制定规则。所谓“黔建省较后，其开辟有赖于僧徒”。^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水江地区的乡村社会更符合这一论断。官方或正是通过这种汉神信仰体系的推行，把握着明清边疆乡村社会秩序的有序运行。

第七章和第八章，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神灵信仰的延续，只不过这里的神灵变成了祖先。在以往的传世文献里，从未有关于清水江地区宗祠情形的记述，但田野调查资料足资证明，从明代以降，族谱的编纂和宗祠的筑建就一直存在于清水江地区，这种宗族化运动至今未息，细检族谱中透露出来的讯息，不仅有“苗”变“汉”的过程，亦有“汉”变“苗”的举动，这种身份置换的背后，多是通过族谱的编修和祠堂的修建等方式来完成的，而更为重要的个案在于，处于边疆的人们，宗族化运动成为其社会生活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在地”而成为“土著”也好，还是努力构建汉人身份也罢，均是他们应对社会环境变动的重要生存方式。

第九章写笔者出生并长大之地，本意试图勾勒吴家埭的村落发展史，并着力于先祖由“汉”到“酸汤苗”的变迁过程，但限于资料，最终还是集中于我从小就翻看的契约文书和参与的清明祭祀，这样的安排不仅使清水江文书为数不多的明代契约得以呈现，并能了解一个小村落的土地利用情形，他们根据所需，把所谓“荒地”“荒山”开辟成了农田、食用油（茶油）兼经济林（木材、桐油、楠竹）种植地，几百年来，他们赖以为生，变动甚少。而清明祭祀在他们的生活世界里，重要性亦不言自明，正是通过这种组织形式，把他们凝聚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在边疆拓殖中成为重要的力量。

另需说明的是，本书绝大部分内容，均带有专题研究之意味，其目的是想把相关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然每一章在成书前，多系单独成篇，角度或主题各异，而为说明问题之需要，史料运用与个别地方或有重复之处，这是需要老实交代的。但本书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仍兼顾着

①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23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系统性与整体性，即民间文书的利用始终贯穿其中，并且明清王朝开拓边疆与经营以及在“神力”作用下的社会变迁亦成为全书的主要线索。不过，清水江文书的发现还在继续，其所涉题域范围既广，旨趣结构亦各不尽同，均需进一步多方钩稽查考各种文献，方能有较为丰厚的研究成果，这些只能以待来日了。当然，不管如何辩解，都是我学力尚且浅陋之表现，然若藉此成为鞭策日后发奋读书、学习的动力，又何尝不是人生快事？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烂纸头”：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与研究	(1)
一、清水江文书的“发现”	(1)
二、清水江文书几种命名方式评述	(4)
三、清水江文书之研究述评	(7)
第二章 清水江文书书写格式的变化与民众习惯的变迁	(20)
一、契约文书的传播	(21)
二、清水江文书书写格式的变化	(29)
三、从“插草为界”到“各具契纸”的习惯变迁	(38)
第三章 协商与日常：生活在契约文书世界里的人们	(45)
一、日常生活中分关文书的订立	(46)
二、日常生活中买卖契约的签订	(48)
三、日常生活中盟约的签署	(50)
第四章 从理讲、鸣神到鸣官：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变迁	(55)
一、“行头媒讲”：理讲风俗及其社会基础	(57)
二、“举头三尺有神明”：鸣神风俗及其运行机制	(67)
三、争讼与鸣官：好讼现象的兴起及其原因	(74)
四、结 语	(85)